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喻长友

(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间人文交流遭受阻隔的时代境遇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文共同体,其相关重要论述具有多重逻辑意蕴。人文共同体是以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真正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遵循世界人文交流融汇、中华文化包容式发展和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逻辑,立足于回答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之问、破除中外文化交流障碍和推进上海合作组织人文交流的实践逻辑,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全球文化治理和国际文化秩序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人文共同体;文化交流;逻辑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3.01.009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3)01-0062-06

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1]。同时他指出,在四个共同体中,人文共同体是其他三个共同体得以构建的桥梁纽带,因此,“构建人文共同体,促进民心相通”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当前国内学术界多从实践维度探讨人文共同体的形成背景、现实困境、发展路径和建构路径等,而从理论维度和历史维度探讨人文共同体的生成逻辑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采用文化哲学的分析视角,从理论发展的维度梳理习近平关于构建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西文化交流实践以及中国文化外交的内在关联,系统阐释人文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真正共同体”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坚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繁荣发展,增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它的产生不仅是时代的召唤和现实实践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渊源。它不仅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且是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和“真正共同体”思想的拓展和延伸,还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一) 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的赓续与发展

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向纵深方向推进,人们的普遍交往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推动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加速转变,进而可以让世界人民分享人类社会发展成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过去那种地方的与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3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殖民扩张,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把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精神产品带到了世界各地,打破民族间的文化壁垒,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依附于现代文明国家,加快了落后地区文明现代化的步伐。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伴随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出现了文化同化现象,“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

[投稿日期]2022-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6BZX005);2022年黑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编号:YJSCX2022-012HLJU)

[作者简介]喻长友(1980-),男,湖北十堰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媒介文化研究。

永恒的历史规律”^[3]。他敏锐地观察到资本全球化会带来世界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冲突,甚至有引发战争的危險。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或“文化中心主义者”,相反他强调的是“民族文化平等民主”。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炫耀自己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超越民族狭隘性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观点^[4],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5]他们指出了“欧洲中心论”的荒谬与无知,主张各民族文化民主和文化平等;认为只有保证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共同发展,世界文化才会繁荣发展,这与人文共同体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导向高度契合。

(二)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倡导全面构建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570}也就是说,共同体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共同体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三种社会形态,并对“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自然共同体”是一种较低层次、以对人的依赖为特征的共同体社会,严重缺乏社会个体独立性。而“虚假共同体”是一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共同体,私有制和雇佣工人剥削劳动造成了社会人的全面异化,“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571}。马克思洞悉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表达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畅想了人类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代替存在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张构建的‘真正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落脚点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和目标”^[7]。因此,人文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促进民心相通、人们共生共存为价值理念,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互鉴和共生共荣,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

共同体’之中,人文共同体落脚到人本身,既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and 最终目标,又是其他三个共同体得以构建的情感纽带。”^[8]二者在价值追求上具有高度的契合与传承。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拓展与延伸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尤其关注各民族人们的民心相通,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价值框架,它进一步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设想和实践探索。首先,人文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享共建的安全格局……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9]作为人类未来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含了国家间人文交流的价值向度,契合了人文共同体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化交流互鉴、互融共生,二者在发展目标和内在价值向度上保持一致。其次,构建人文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奠定了民意根基。人文共同体以相互性、平等性与包容性为原则,以“民心相通”为根本目标,实现了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流往来,加强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起到国家关系稳定器、务实合作推进器、人民友谊催化器的作用^[10]。同时在构建人文共同体的过程中,以各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提升为目标,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客观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人文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人文交流新主张、新理念,主张建立文化多元、平等交流和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文明治理新秩序,这就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文化优越论”,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有效消解了“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为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路向提供了价值引领,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补充,丰富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观”的时代内涵。

二、历史逻辑:世界人文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式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文化外交的经验总结

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一部中西文化发展的

历史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历史,而人文共同体的相关论述汲取了世界人文交流的历史基因,又立足于新时代的人文交流实践,提出了“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交流观。

(一) 遵循了世界人文交流的历史发展逻辑

从世界人文交流历史来看,虽然我们无法考证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展人文交流,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人文交流是一个从偶然、零星到频繁的、大范围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人类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各人类群体生存环境恶劣,彼此生活隔绝、孤立,几乎没有人文交流。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水平的提高,人们产生了相互交换劳动产品的需求,相邻或相近地区的部落之间开始迁徙交流。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展了人文交流,如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的人文交流。“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印度形制的印章就证明古印度文化有过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交往。”^[11]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期间是人类人文交流的大发展时期。得益于商业贸易和交通水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和提高,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和中华古文明,而亚欧大陆出现的“丝绸之路”则推动了几大文明古国和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同时,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等,成为各民族之间开展人文交流、融合的助推器。“希腊文化深深影响着罗马文化。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罗马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希腊文化的渗透,公元前3世纪至共和晚期,罗马对希腊文化经历了模仿到调适的过程,帝国时期出现了罗马和希腊文化的融合趋势。”^[12]中世纪以来,各民族人文交流进一步加快,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各民族人文交流以文化圈为核心向周边辐射。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为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通与发展提供了契机。自14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的全面扩张,各民族相互联系的空间维度进一步拓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逐渐从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同时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世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东西半球的人文交流碰撞和融通,拉开世界人文交流的序幕,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形成。18世纪中叶,随着两

次科技革命的全面开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在西欧国家逐步确立,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文化迅速在全球传播开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全面发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正演变为人文交流的一种必然趋势,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的速度和广度产生了质的飞跃,世界文化多样化逐渐彰显,而人文共同体继承了这一历史发展逻辑,强调尊重各民族文化特色和差异,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广泛开展各民族的人文交流、互鉴和融合发展。

(二) 遵循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历史发展逻辑

中华文化不仅是一种绵延悠久、光辉灿烂的文化,而且是一种“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的文化。它是在与国内各民族文化、国外异域民族文化相互输出接纳、交汇相融中形成的文化。从我国各民族文化交融历史来看,农耕经济的持续性和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华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日臻博大,而且还长期吸取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增添异彩。”^[13]秦汉以来,我国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在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取得了持续发展,造就了中华文化蓬勃的生命力。历史记载的最早人文交流是“周穆王西巡”。周穆王时的周王朝与西北草原民族开展全方位交流,“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14]周穆王在西巡时,与其他民族相互赠送礼物,并与西北地区的羌族、塞族等进行了友好的人文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最终鲜卑族建立政权,但鲜卑族广泛推行汉化政策,扩大了中华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增强了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古“丝绸之路”,打通了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要道;宋朝的契丹族、女真族和党项族,元朝的蒙古族和清朝的满族等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开展了大规模融合,经历了多轮的民族文化大交汇,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也发生过多次冲突与融合,在这些冲突与融合之中,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不断地吸收异民族文化中优秀文化因子而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这也是中华文明具有勃勃生机的原因所在。如东汉以后的佛教东来,唐高宗派玄奘天竺

取经,派王玄策四次出使印度等,佛教文化与中国儒家、道家等文化的摩擦、冲突与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和宋明理学等佛教中国化成果。元朝忽必烈在文化上推行兼容并蓄的政策,全面开展中外文化交流,这时的《马可·波罗游记》推动了中华文明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与南洋各国、阿拉伯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开创了中华文化外交史上的壮举。明清之际的基督教东渐,基督学士传授科教文化促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鸦片战争以后,民族救亡图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中国仁人志士全方位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汇融通。人文共同体相关论述主张弘扬“海纳百川”“会通中外”和“兼收并蓄”的文化包容精神,鼓励各民族文化交流及互鉴,传承了中华对外交流的优良传统。

(三)秉承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外交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文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理念,以及坚决反对国际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外交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15]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外交,以“一宣传三寻求”的文化出访准则,广泛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协作;同时妥善处理在华的教育、文化机构,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控制权。这一时期“乒乓外交”是文化外交的经典范本。二是改革开放之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文化外交,根据世界发展态势与中国发展实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文化外交思想,纠正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错误文化外交理念,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外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外交原则,以文化合作的姿态开展文化交流,推行以“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同时进行商业运作”的文化运行模式,促进文化外交方式多样化和科学化,如举办相约北京—非洲主宾周、中法互办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等活动。面对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设立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等合力推动文化外交。三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全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互惠互利的人文交流,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主张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借鉴、和谐共生;积极开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建构对外文化传播格局,尤其提出了人文共同体建设,开创了我国文化外交的新局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各国的认可和赞许。

三、实践逻辑: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实践、人文交流困境和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反思中回应了时代命题

新时代孕育新理论,进而指导新实践。习近平提出构建人文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不是凭空幻想和随意捏造的产物,而是回应全球人文交流发展的需要,力求破除各国人文交流的障碍和壁垒,为世界人文交流指明了路向。

(一)上海合作组织核心主题的弘扬与发展

学者李琪指出:“‘构建人文共同体’是在科学总结国际和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凝练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题之一。”^[16]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遵循协商一致、开放包容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摒弃了文明冲突、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的旧观念,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发展理念,切实维护各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多领域合作发展,使得上合组织成为世界上面积广、覆盖人口最多的国际区域性组织,成为当前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建设性力量。文明的建设维度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石,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话国和观察国所处地域横跨欧亚大陆,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各国间因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形成了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形成了多元差异文化。这种多元差异文化一方面促进了文化间的相互吸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化隔阂、文化误解的产生,严重影响了人文交流合作。因此,习近平在上

海合作组织第十八次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讲话中指出:“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减灾、媒体等各领域的合作。”^[17]他主张中国与各成员国不仅要开展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而且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各自社会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倡导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彼此共同发展繁荣。

(二)全球人文交流困境的反思

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逻辑全面扩张的阶段,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倾向愈加严重。西方宣称“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观念是“普世价值”,民主政治模式是普世政治模式等,凸显西方文化中心论,阻碍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扰乱了国际社会秩序,加重了民族文化矛盾。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倾销和渗透,处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坚守状态,在“文化普遍性”和“文化个性”的选择中,出现了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思潮,以本民族文化为本位,不主动吸纳、融合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彼此间的人文交流的阻隔进一步加大。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各国人文交流遭受阻隔、民族文化冲突进一步加剧,各国人文交流合作遭受阻击,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西科技文化交流设置重重障碍,大面积强制关停孔子学院等。面对人类的共同灾难和人文交流困境,习近平提出“加强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主张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

(三)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路向的积极探索

当前我国文化传播存在诸多困境与传播障碍:一是存在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困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主张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有效传播,需要各国人们产生文化共知、共识和共鸣,但由于各国存在宗教文化差异,认知偏差与误解经常产生。如有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推行核心价值渗透战略,是“中国威胁论”和“国强必霸”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二是存在异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和重构困境。中国传统文化也内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实现跨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对中国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进行“因地制宜”的阐释与全面解读,让各民族人民对其产生价值认同和生活认知。然而当前世界文化生态的不平

衡使弱势民族文化产生了狭隘的本位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三是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任重道远。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存在自说自话的倾向,致使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无法被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解,这就要求我们用“趣味的和渗透性的方式”建构话语体系,强化中国话语自主权,主动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被纳入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体系。由于各个国家政治体制和价值理念的不同,多样化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和冲突,加上西方国际媒体的大肆渲染和污蔑,少数国家人们对人文共同体理念产生了错误认知和抵触心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广泛的人文交流对话,将中国经验背后的核心价值和文明理念呈现出来,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和塑造力。

总之,习近平关于构建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逻辑、厚重的历史逻辑和应然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开展对外人文交流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是我国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结晶。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一带一路”纵深推进过程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失衡、地区安全存在威胁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施加干扰,各国开展人文交流面临的困难日渐增多,这要求我们积极构建人文共同体,促进彼此民心相通,为各国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与进步。

参考文献

- [1] 邓浩. 以“四个共同体”回应时代之问[J]. 人民论坛, 2021, 699(8): 80-83.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68.
- [4] 张殿军. 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世界文化交流思想[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2): 80-8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46-47.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1.
- [7] 万秀丽, 陈学琴. 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指向、承继与发展[J]. 理论导刊, 2020, 429(8): 55-62.
- [8] 周鑫宇, 任冬旭. 冲突背景下人文共同体的对外阐述[J]. 对外传播, 2021, 293(2): 8-11.

- [9] 马俊峰, 马乔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13.
- [10] 刘延东. 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 (2018-02-07) [2022-11-04].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2/t20180208_327115.html.
- [11] 杨玲. 文化交往论[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95.
- [12] 陈恒, 鲍红信. 希腊化, 还是罗马化——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适与创新[J]. 史林, 2011(5): 150-155.
- [13]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3.
- [14] 左丘明. 国语(卷一)·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
-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83.
- [16] 李琪.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推进[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0(2): 5-23.
- [17] 习近平. 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

[责任编辑 李 新]

The Triple Logic of Xi Jinping's Remarks on Constructing a Humanistic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Yu Changyou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precedented centenary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humanistic exchanges, Xi Jinping puts forward the idea to construct a humanistic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his relevant important remarks contain multiple logic implica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rx's though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al community and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llow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of humanities, China's inclusive way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This concept is also based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today,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promoting the humanistic communication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ccordingly, China wisdom and China solution are provided to the world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world,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order.

Key Words: Xi Jinping; humanistic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cultural exchange; logic